

起点与困惑：早期中国文学批评史写作的启示

刘文勇

内容提要 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为一个学科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诞生之后围绕它曾经有过坦率尖锐的讨论与争论。参与讨论争论的人，既有在读的大学生，也有刚毕业一年左右的大学毕业生，更有大学教授。所讨论争论的问题，从具体的知识问题到观念问题皆有。讨论争论中显示出了若干的困惑，既明白不这样建立一门学科不行，也知道就这样建立一门学科又难以与古代对接。讨论争论到最后回到了核心的问题：如何写“中国文学批评史”。直到今天，这恐怕也是一个仍然没有解决好的核心问题。

中国文学批评史成为一个学科是现代的事情，准确的说，是1927年后的中国的事情。但是，把传统的诗文评演绎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却不是偶然的事情，从长时段的历史观上看，这是一个现代的必然事件。之所以说是现代中国必然的文化事件，原因在于，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之前，已经有了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这些科目与名目，从传统走向现代似乎是中国文化与学术的宿命，彼时的当事者就颇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而自矜不已，胡适对自己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就非常的自信，认为：“中国治哲学史，我是开山的人，这一件事要算是中国一件大幸事。这一部书的功用能使中国哲学史变色。以后无论国内国外研究这一门学问的人，都躲不了这一部书的影响。凡不能用这种方法和态度的，我可以断言，休想站得住”^①。胡适所自信的这一潮流也就是当时学界所盛行的“整理国故”运动，而国故是一个总名词，涵盖宽泛，诗文评是古时的名称，当然也应该是国故之一，被整理当然也是应有之义，故而诗文评被整理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也合乎逻辑地成为整理国故运动的结果之一。这一治学风气的转移当然是三千年未遇之剧变，有学者称之为“典范的转移”，只是当时的学界对这“典范转移”的评价不同而已，赞成者称之为巨大的进步，批评者或者反对者则斥之为“邯郸学步，反失其

故”，伴随这一典范转移的争论也就历史地摆上了桌面，供我们这些当代人揣摩思考。本文无意对整个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的这一典范转移后的争论做出观察与讨论，只是对中国文学批评史这门学科建立之后的有关这门学科的讨论做出梳理，并做出自己的一些评判。

一

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为一个学科而出现的标志，当然是1927年陈钟凡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出版。但是，该书出版在学界并未引起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那样的影响，议论者不多，而本来比较少的议论也以负面为主，其中冷眼所发表的《陈钟凡抄书都错》是一篇比较激烈的回应，作者以为“抄书本是一件机械的事”，但是陈钟凡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却“连抄书都要抄错”，作者所举出的例子是该书的第49页所列的钟嵘的《诗品》中溯源流的一个表的问题，陈钟凡先生在该书第48页把钟嵘《诗品》中所说历代五言诗人按照源流，分为三派，接下来的49页陈先生就以国风派、小雅派、楚辞派三派图表之，而在楚辞派的图表中，谢瞻、袁淑、王微本来“源出于张华”，应该列在张华下面才是，但陈钟凡先生所列图表中却显而易见地把这三人的源头

列到了卢谔的名下。这当然是硬伤,如果陈钟凡先生在再版的时候改正,本也算不了什么大事,但是《陈钟凡抄书都错》一文作者冷眼却不依不饶,以为“为什么此书现已再版,依旧没有加以更正呢”?作者于是决定当一回义务校对,以正确图表更正陈钟凡先生书中的图表错误,并希望陈钟凡先生“为免得贻误青年子弟起见,赶快予以更正”^②。与此同时,署名为“开脱”的作者的文章《公文程式化的大著作》则对陈钟凡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加嘲讽挖苦,作者自己叙述说本是抱着热切的心情去购书,但到手一看却大失所望,以至于“疑心不是陈先生的大作”,而以为是日常伺候着陈先生抄写什么的书记先生“偷空瞒着他老先生随便凑集拢来而托名求售的”,作者以为该书的结撰既特别又寻常,而其所指的特别并不是褒扬该书,而是该书按朝代“一章一章地骈列着,整齐而好看,只见朝代的起伏,文学的批评便会乖乖地跟着它们的兴灭而自成风气……什么文艺思潮,什么时代背景,一切可以不问,而依然不失为史”。作者所谓的寻常指的是该书的“分期”与“取材”这两个方面,对此作者开脱均进行了尖刻的批评,以为该书虽分中国文学批评为八期,但是归根究底还是“断代为史”,只见朝代名号的变化而不见“作风的迁流和评坛的中心思想怎样演变”,对于其取材,则以为连北京大学预科用的讲义《文论集要》还不如,作者挖苦说北大预科用的讲义还写着讲义的名称,最多给它一个混名《文论集要》而已,以示与学术论著区分开来,“终不能骤称之为文学批评史也”,而陈先生的书居然就号称是学术论著堂而皇之的称之为文学批评史了,作者最后讥讽说该书只是“公文书的所谓‘装头脚’”的“公文程式化”而已^③。冷眼与开脱的文章主要着力于找技术性问题的硬伤,批评作风也不具有多大学术性,更没有关注陈钟凡先生该书中的观念问题。

陈钟凡先生到底是什么观念,在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书中和《求学与读书》一文中均有相关表述。在《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一章“文学之义界”中,陈先生首先梳理了“历代文学之义界”,这部分全是中国自身的,他从孔子开始一直梳理下来,梳理中国部分后,陈先生书中接下来论说的是“近世文学之义界”,所谓“近世文学之

义界”全部就是西方的,其中引了西方几个人的观念,一个是法国的批评家佛尼的:“凡人汇合其一身而表见于他人之文章,皆谓之文学”;第二个引的是英国的批评家埃诺特的观念:“文学乃一广博之名,其意可指一切缮写或印刷之书籍。”第三个引用的是美国人亨德的《文学原理及问题》里面的说法,亨德是这么定义文学的:“文学者,藉想象、感情及趣味以表现思想之文字也。”陈先生以为亨德是在检讨诸说后对“文学”下的“精确之定义”。在引用了中外这么多观念之后,陈先生当然必须表态他写这本书打算用什么观念,我们最后也确实看见了他的表态,他说“姑妄定文学之义界”,曰:“文学者,抒写人类之想象,感情,思想,整之以辞藻,声律,使读者感其兴趣洋溢之作品也。”^④把他的定义和美国人亨德的定义对照,可以看出,他写这本书,所用观念基本上就是美国人亨德的《文学原理及问题》里面的说法。陈钟凡先生确乎是与时俱进的在使用着文学观念,至少是在使用着最前沿的观念撰写自己的这部著作。他的如此观念,是符合当时的大潮流的,所以批评者对其观念层面的批评反而更少见,何儒的《陈钟凡先生的观念问题》就是这极其少见的批评其观念的文章之一,但是批评者却批评得极其简单笼统,该文中四处提到对陈先生所说的观念感到“莫名其妙”,从其反应看,文章作者似乎还是一个正在“求学”的青年人,故而他以为陈钟凡先生没有说清楚“怎样才是时代的观念,怎样才是进化的观念”,以至于使青年人不知道“用怎样的观念才能去求学”,最后的结论是“陈先生的观念问题”本身还“算是一个问题”^⑤。

有批评当然也应该就有反批评,反批评的主角理所当然的应该是《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作者陈钟凡先生,但是陈钟凡先生似乎无意回击这些批评,署名季通的文章《容旁观者说几句公道话么》中就透露了情况:“《文学周报》第三四二,三四五,三四六各期中,连载汪静之,开脱,冷眼三君对于陈钟凡君的攻击文字,我问他:何不答复?他说:‘我在《暨南周刊》上已经申明过,再不答辩了,现在这种文字我概不寓目,何从作答?’”但是,陈钟凡先生在《暨南周刊》1928年第3卷第10期上的答复申明信《答汪静之先生“讨论诗经伯兮问题”的信》却是针对汪静之对其

《中国韵文通论》中的问题的批评攻击而申明“永远置之不理了”^⑥，在该信中并没有答复别人对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批评攻击，所以答复别人批评攻击陈钟凡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就成了《容旁观者说几句公道话么》的作者季通。对于冷眼批评陈钟凡先生抄书都要错，季通首先承认陈先生此书中的图表“与原文不合，这也是的确的”，但接着就话锋一转，把责任归罪于改版人与校对者了，说陈钟凡先生的书在再版时候，手写稿中是修改对了的，但改版人没有理解陈先生所画的那些线条的意义，没有作出修正，校对人也未查出错误，从而再版时候也没有校正过来，而季通也指出冷眼先生校正陈钟凡先生错误而指出这几个人“源出于张华”，但是最后“《文学周报》上又把几个名字改列于张协之下，这不是以错易错么？”以此明示陈先生书中的图表错误的责任是校对者无疑了，并劝大家都别“再闹闲气了”。而对于开脱先生《公文体式化的大著作》一文中对陈先生的指责攻击，季通则以陈先生曾经编过二百余篇的《历代文学评论》来与只有五十多篇的《文论集要》相比较，并说陈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所用材料也只有十分之二三与《文论集要》相同，十分之四五与《历代文学评论》相同，不过季通也承认陈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史》确乎简略，但“搜罗材料，也稍费一点力量”，并不是偷懒投机取巧之作，而对于指责该书大胆使用“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名称出版，季通也作出解释，指陈钟凡先生本没有打算出《中国文学批评史》这部书，但是陈先生在写完《中国韵文通论》后，又“把古人对于文学的批评，附带说个大概，作为比较”，书稿送出版社后，中华书局审稿后请他分为两部书出版。按季通在文中提供的信息，《中国文学批评史》这个书名都是陈钟凡先生“他自己也不愿的”^⑦，似乎成了中华书局给定的这个书名了。这些辩护中提供的信息到底有多少是真实的，现在已经难考，但据现在有学者翻检搜罗到的《广东大学周刊》第二十八号（1925年10月26日）中的《文科朝会记》中的记录“陈中凡学长报告”云：“……拙著《中国文学批评史》，年内皆可成书”^⑧，似乎陈先生“他自己也不愿”是“中国文学批评史”这个书名就很值得大大的怀疑。此问题都值得怀疑，那么其他方

面季通先生提供的信息恐怕也值得怀疑。

而从后来朱自清先生对陈钟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评价来看，也是负面为主。朱先生在评价的时候似乎都不愿意提及陈钟凡先生的名字，轻视之意应该说是明显的，他写道：“郭君的书出版前七年，已经有人写过一本《中国文学批评史》。那似乎随手拾掇而成，并非精心结撰。取材只是人所熟知的一些东西，解说也只是顺文敷衍，毫无新意，所以不为人所重”^⑨。朱先生所说的意见中在前面介绍的几个批评者那里基本上都可以见到，这可能说明大家的意见基本上是一致的，而朱先生所说“不为人所重”也说明了即使是批评者也较少的原因了。

诗文评演绎为一个现代的学科，在当时的文化环境下是事属必然的，但名称定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好像又有些偶然，如果当时把名称定为其他的，恐怕也就形成惯例而沿袭了下来，但现代历史上恰又就定为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于是一门学科就这样诞生了，但这诞生，又充满了那么多的指责攻击与讥讽挖苦，实在是有些令人深思。而从其诞生来看，一诞生就染上了明显的近代西方色彩，不知道这是幸事还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胡适自信他推出《中国哲学史大纲》对于现代中国是一件幸事，但陈钟凡先生推出《中国文学批评史》似乎就没有显示出胡适这样的自信，有强烈的自信当然说明是精心结撰的产物，没有强烈的自信是否可以理解为确实是“随手拾掇而成，并非精心结撰”呢？我想大体上是可以这样认知的。当然，当代有学者为陈钟凡先生抱不平，认为朱自清先生的评价“有抑扬过甚之处”^⑩，这是可以继续探讨的问题。我认为，虽然这个开端是一个不愉快的开端，不甚成功的开端，或者在当时一些人看来是糟糕的开端，但是，它确实又是一个开端，开端就是贡献，这个方面还是不能抹杀的，但现代或者当代的不少学者，似乎都不太愿意承认这个事实上的开端的贡献，而把对中国文学批评史这个学科的开创贡献给了稍后推出《中国文学批评史》的郭绍虞与罗根泽等人，甚至于认为郭、罗两人或者郭绍虞先生才真正代表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现代起点，这似乎也不符合客观的历史事实。

二

即使按照现当代一些学者的意见,把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真正起点放到郭绍虞、罗根泽各自推出《中国文学批评史》的1934年,那么是否情况就是一片赞扬之声呢?事实上情况也并不如是,确实有不少的褒扬,但批评也是尖锐的,甚至于有接近否定的,当代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界似乎一般讲到了赞扬,却少于讲到那些尖锐的批评。这些批评有的价值高,有的价值低一些,有的批评甚至于等同于漫骂性的挖苦讥讽,价值可能就更低一些了,但是,历史的呈现需要完整,而不能选择性的提供局部意见以代替整体性的景观。

郭绍虞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在1934年出版,彼时郭先生在燕京大学任教,书出版后在燕大学生中就引起了论战或者混战,发难者是一位就读于燕京大学的学生MF,该生自称“并非专攻文艺的人,在中学时代看过几本关于西洋文艺思想的书,因此对于文学批评有相当的兴趣”。而他的这一兴趣引起了对本校郭绍虞教授的敬佩,由敬佩而又生出想去旁听郭教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程的冲动,但看了发布的课程公告中有“预备学旧诗词的才配研究文学批评”的要求后,冷了半截心,但是又不甘心,于是从图书馆借了一本郭先生新著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来过瘾,该生自叙说读了八页之后,就开始怀疑他以往听到的话,再读下去,则落入了大失所望的境地,以至于郭先生在他心中的形象全毁。失望之后当然就是批评了,他提出了ABCD四个方面的批评:取材似乎失当,标点似乎错误,文理似乎欠通,见解似乎陈腐。前三者涉及到的都是技术性的问题,第四个方面涉及到了观念的问题。MF以该书第四篇魏晋南北朝为例来论说“取材似乎适当”的问题,以为该篇取材“除了几部要书和一二篇重要的文章”外,基本上都是“客套式的书简”,对于以下几篇中充斥着“神”、“气”字眼的材料,MF也以为“大半是废话”,是“‘徒乱人意’的东西”。在讨论郭先生书中标点问题的时候,MF以书中引用刘知几《史通》书中和《孙樵与贾希逸书》文中的材料的标点为例来攻击郭绍虞先生,以为“我小学生也知道刘知几全部《史

通》是流畅的骈文,而郭教授居然把它标点得七零八落,我真有点替刘氏不平”,对于“文理似乎欠通”的问题,MF引用了郭先生书中几句话来说明其文句使用上的问题。而第四个方面所谓“见解似乎陈腐”则涉及到MF指责郭先生观念还不够新,还没有达到“最进步的专门的立场”,在他看来,有了这个立场“方才所有的旧材料都能给他一个新的生命”^⑩。MF的文章一出,批驳的文章就出来了三篇,都发在《燕大旬刊》上,楚狂的《读MP君的“读郭绍虞先生的文学批评”》、吴晓铃的《读“读郭绍虞先生的文学批评史”》、蜀翁的《读“读郭绍虞先生的文学批评史”》,蜀翁在反批评手法上采取了以其人之法还治其人之身,指责MF的批评文章“词意笼统”、“见解武断”、“卖弄聪明”、“自视不明”、“妄肆讥评”^⑪,而对于书中标点问题,辩护均以“手民所误”来进行,这可能也是事实。大体观察,反批评的风气也接近于批评者MF的风气,大多流于意气之争,用语刻薄尖酸,其批评与反批评的价值均不大,但为了历史存真,也不妨把发生在彼时郭先生所在校园里的这场混战简略记录下来,也可以大体上让今日学子知道这门学科早期的风风雨雨,而不至于以为郭绍虞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一出,大家都一片赞扬,于是成为现代治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典范与标准了。

当然,当时学界还是有赞扬之声的。李青崖就认为这是“近年来国人整理文学遗产的一个大贡献”^⑫。张长弓在评价郭先生著作时候,既有商榷,更有赞扬,所商榷者一是认为讨论先秦诸子的文学观的时候郭先生“舍弃了几家”而不论,以为有“遗珠之憾”,二是郭先生在书中对《诗大序》中的“赋比兴”没有“特别加以阐发”,三是作者不同意郭先生把《西京杂记》中司马相如答盛览问赋一段话“直认为汉人的话无疑”,作者以为“以文体与内容言,恐应视为六朝以后的东西”,除了这些文雅的商榷外,其余都是赞扬,而且评价很高,这赞扬是把郭绍虞先生与陈钟凡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加以对比而作出的,以为陈钟凡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虽然最早,但是却偏重于史料的陈列,对于文学批评自身以及前因与后继的影响,均没有像样的分析,张长弓以为陈先生的书“未尽却史字的任务”,正因为

如此，所以他认为陈先生的书虽然最早，但却大体不能算数，可以忽略不计，相反，他认为郭绍虞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出版才“实为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第一部书”，在文末作者还说道：“凡有志于文史者，皆有‘人手一编’之必要，我以为是书与冯芝生博士之《中国哲学史》可以称为数年来出版文哲书类的两大名著。”^⑩

真正对郭绍虞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做出有实质性价值的赞扬与质疑批评的还是朱自清先生与钱锺书先生。

朱自清先生对郭先生的书首先就是赞扬，他认为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写作中国文学批评史有两大困难：首先，这是一件全新的工作，材料的搜求上几乎就是白手起家，“得自己向那浩如烟海的书籍里披沙拣金去”；其次，搜求到材料不能仅仅罗列材料了事，于是乎就得有自己的理念与架构，“得建立一个新的系统来”，朱先生认为这件事情比第一件事情还要困难，但这两大困难在朱先生看来都被郭绍虞先生克服了，所以，他认为虽然郭先生的书“不是同类中的第一部”，但因为“他的材料与方法都是自己的”，所以“还得算是开创之作”，这意见与上述张长弓先生的意见是一致的，但朱先生的文章在前，是否张长弓先生袭用朱先生的观点未知。在观念使用层面，朱先生对郭先生该书也抱持着好感，朱先生承认在他那个时代已经是很西化了，“现在学术界的趋势，往往以西方观念（如“文学批评”）为范围去选择中国的问题；姑无论将来是好是坏，这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事实”^⑪。这一点在范文澜先生开设“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课程说明中也可以见出当时的一般情况，“课程说明”中的课程名称是“中国文学批评史”，授课教师是“范文澜”，其课程说明具体文字是这样的：“取历代各家之文论，诗话，词话，曲话，用近代文学批评眼光作一有组织的叙述。使学生明了中国文学批评演进之过程”^⑫。虽然学界已然如此状态，但是在朱先生看来，郭先生在该书中用西方的分类方法来处理中国的材料上“却很审慎，书中用到西方分类的地方并不多”。在赞扬一番之后，朱先生笔锋一转，就开始商榷与质疑起来了，以为书中大量使用纯文学、杂文学的观念就颇为值得商榷，以为“各时代文学观念不同，最好各还其本来面目，才能得着亲

切的了解；以纯文学、杂文学观念介入其间，反而多一番纠葛”。对于郭先生书中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观念是“离开传统思想而趋于正确”的看法，朱先生也颇不以为然，认为“以我们自己的标准，衡量古人，似乎不大公道”。至于书中的一些技术性的问题，朱先生也多有指出，例如对郭著中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分期中的第三期“文学批评完成期”的名称，朱先生就以为修改为“集成期”为好^⑬，这意见也很正确。诗文评被现代化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最关键的问题恰恰就是文学观念的问题，太过于近代或者现代了，与古不合，太拘泥于古代，又无法理出一个头绪。在这观念层面的处理上，郭先生虽然有所小心，但毕竟还是落入时代的陷阱，这不得不说是无可奈何之事。因为如此，所以，朱先生和其他批评者比较起来，看问题确属高人一等，观察一本书而能够看进其血肉里面（观念层面）。技术性的问题容易批评，也容易看见别人的问题，但观念层面的观察确乎需要有登高望远的才能才行。

与当年已经36岁的朱自清先生相比，当年才24岁的钱锺书先生也在见识上不落于朱先生之下，其时的钱锺书先生刚刚从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一年，但眼界之高在其评价郭绍虞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就已经显露得很充分了。学生辈的钱锺书先生批评起老师辈的郭绍虞先生的书来，也并不那么客气，但是很文雅的不客气，其对郭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批评主要见于其《论复古》一文中。钱锺书先生对该书的观念层面极大的不认同，认为在他那个时代“藐视复古似乎是极时髦的态度”了，而郭先生恰好就是“不甚许可复古”的人，以至于认为越新越好，主张起“‘纯文学’才是‘正确’的文学观念”，而郭先生又认为纯文学观念是进化来的，于是又对进化表彰了起来，既然郭先生主张纯文学观念，主张进化，当然就反对复古观念了。讲到这里，就得略微提及一下郭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基本架构了，该书从宏观上把中国文学批评的历史分为三期，第一期从周秦始，止于魏晋南北朝，被郭先生认为是文学观念的演进期；第二期是隋唐五代到北宋，是为文学观念的复古期；第三期从南宋到金元再到明清，是为文学批评的完成期。这三期里面，郭先生当然主张的是演进与进化了，

对隋唐北宋的复古是颇为有意见甚至是反感的，但是，对于“进化”与“复古”，钱先生却有着与郭先生几乎相反的看法，钱先生写道：“对于‘进化’两字也得斟酌。……我们不能仓卒地把一切转变认为‘进化’。从现在郭先生主张魏晋的文学观念说来，唐宋的‘复古’论自然是‘逆流’与‘退化’了。”基于这个前提，钱先生就戏谑性地推理道：“假使有一天古典主义翻过身来（像在现代英国文学中一样），那末，郭先生主张魏晋的文学观念似乎也有被评为‘逆流’的希望。”这几乎就是要推倒郭先生该书的基本架构与基本写法了，观念层面既然出现如此大的问题，材料再丰富恐怕也是写出的一部错误的书籍。通过戏谑而话已经说到这么重的程度了，但钱先生并不罢休，继续暗示该书缺乏历史意识，以为“在无穷尽、难捉摸的历史演变里，依照自己个人的好恶来定‘顺流’、‘逆流’的标准——这也许是顶好的个人主义，不过，无论如何，不能算是历史观”。既然不能算是历史观，那么写作出来的东西也就不符合历史本身的事实了。钱先生的批评当然是严厉的，但是，确乎又是严谨的。在文中，钱先生还指出宋代道学家的“文以载道”说“只限于道学的范围”，在道学家的坐标系中“算不得文学批评”，只有道学家谈文学的时候的意见才是“文学批评”，这也纠正了郭先生把二者混同不分的问题，再进一步，钱先生还否定了郭先生所谓的道学家是复古的看法，他从“道”的超时间性推出道学家推崇道以及推崇“有合于道”的“古昔圣贤”在原则上“并非‘复古’”，在这一前提下，钱先生继续发挥出新的结论：“假使道学家并非‘复古’，那么，唐宋古文家也不得为‘复古’”^⑧，这些结论，细想一下，几乎把郭先生所写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二期给否定掉了。与朱自清先生对郭绍虞先生该书的批评相比，钱先生确实批评得相当严厉，看问题基本上避开碎屑的问题，而从大处着眼进行，所以，其批评虽然严厉，但严谨而又大气。钱先生这样批评别人，当然他对自己的要求肯定也就既高又力求不犯这种“现代病”了，因为如此，所以钱先生的著作无论《谈艺录》还是《管锥编》也就力求与现代学界的写作风气保持相当的距离，从而成为现代学术界一道独特的风景。

郭绍虞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被朱自清先生视为“开创之作”，对此后的中国古代文论或者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即使到今天，不少新出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著作写作范式也大体上没有脱出郭先生这本书的范围，其影响是好是坏恐怕现在还难以下一个定论，不过，回顾一下郭先生这部书在出版不久后不同人的反应，应该可以给今日的学界若干的启示。

三

与郭绍虞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差不多同时而略晚一点的就是罗根泽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了，但当时（1934年）只写到魏晋南北朝，到1943年—1945年以四分册出版的时候，也只写到晚唐五代。与郭先生的书出版差不多同时，既可能是好事，也可能是坏事，但好像刚刚出版的时候首先遇到的就是坏事，张长弓先生在《读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一文中的末尾有一个“附记”，其中写道：“顷有友人自北平来函，称罗根泽君亦有《中国文学批评史》出版，惟罗著全系根据郭先生批评史讲义而成，但编法不同。郭著合讲者，则分述之；所分述者，则合讲之。此书未见。按罗君是郭先生受业生，去年到清华教文学批评史一课，即为郭先生所让与者，其改编郭先生讲义，想亦可能事也。”^⑨这意见恐怕多半是猜测而已，罗根泽先生的书与郭绍虞先生的书既然都是中国文学批评史，那么材料不可能太不一样，叙述的对象也不可能差之甚远，只是搜罗材料方面罗根泽先生是否是完全独立于郭绍虞先生的书而自己搜集的是可以有所疑问的。写作这样一部书，材料当然是前提与基础，但更关键的还是对材料的处理及其态度，而在处理材料这个层面，罗先生似乎很不同于郭先生，正如振珮先生所说：“在罗著出版期前三月，有郭著《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这本书虽是以自己的材料说自己的话，但全书只不过是著者一元论史观的说明，从体系上讲，虽其有相当的特色，而削足适履的弊病，在全书中却也很多。”郭先生是这样的在处理着材料写出这样的一本书，那么罗先生写出的是一部什么状态的书呢？振珮先生以为，与郭先

生写作《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主观风格相反，罗先生的著作则“站在纯客观的立场，不受主观见解的束缚”，从而“显示出治史者严肃的态度”^②，在振珮先生发表此文之前，已经有林庚先生、周本斋先生发表书评来评价该书了，而振珮先生很同意林庚先生在《大公报》（1935年1月13日）上的书评中的观点的（“不以固定的史观，来说明整个文学史的演变，他是站在更客观的立场”），对周本斋先生在《文学》四卷一号上所发表的书评中提出的一些技术性问题，振珮大多不同意，而为罗根泽先生辩护，以这些书评以及亲自阅读罗著的情况判断，说罗先生的书是“改编郭先生的讲义”恐怕是难以成立的。

而李嘉言在《文哲月刊》上的书评文章对罗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态度则更加的谦虚，他以为自己对该书“不敢言批评，只是介绍”，全文看下来，也确乎基本上是介绍，但其中有一段感叹还是不错的，可以看出学科开创期之难：“作文学史难，作文学批评史尤难，原因是这种学问大概乃新起，无可师承；方法须要自己创造，材料须要自己搜集。文学史材料倒不成问题，难关只在方法与见解。文学批评史则在材料上亦成问题。所以文学史虽无多佳制，而量上已足可观，文学批评史则至今算来也不过四部，由此看来，文学批评史确较文学史难为了。”以这种心态观察当时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当然具有了解之同情，但是，李嘉言对这四部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著作并不是认为价值等同，他以为四部之中，郭著与罗著“较为人所称道”^③，这大概也反应了当时学界的基本态度。

但是，对罗先生的书采取严厉批评态度的也不是没有人，林分的《评“中国文学批评史”》一文就是例证。作者在文中感叹当时的有关中国文学的著作，无论是批评还是史论，日本都有“成数的著作”，而转看国内，本国人“有志于斯道的又太少，仅有郭绍虞、方孝岳等几本中国文学批评史”，有鉴于此，林分先生认为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基本状态“还是在草创的时期”，这个分析与结论应该是成立的。既然是草创时期，所以上述李嘉言先生基本上都不怎么去批评这些著作，只是介绍，而林分先生却与李嘉言先生态度相反，对这仅有的几本中国文学批评史著作特别是罗根泽

先生的著作作了严厉的批评。文中总共列出了六条意见：搜罗宏富，组织庞杂，滥凑篇章，忽略源流，胶柱不化，望文生义。除了第一条是表扬外，其余五条都是批评，而且是很严厉的批评。通读这篇批评的文字，论说是严谨的，特别是“忽略源流，胶柱不化，望文生义”这三条的论说上，至今来看林分先生的分析与结论基本上都是正确的。罗先生在解说曹丕《典论·论文》里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句话的时候说“文学价值的提出与承认，当归之曹丕”，而林分举出大量的周秦两汉时期的材料证明曹丕不过“袭旧”而已，并非曹丕“他个人独创出来的”，林分先生说此种情况“书中类此尚多，不及毕载”，所以他认为这些均足证罗先生“所见不深”，以为这是该书“忽略源流”的显证。罗先生书中对扬雄早年好赋壮年卑赋说是体现了扬雄“冲突的心情”，更是“整个儿的时代的冲突”，而不仅仅是扬雄“自己矛盾”，林分先生认为扬雄“卑赋是在成年，好赋是在少年”，前后不一致自然有原因也很正常，同时他又认为看不起辞赋本是汉代普遍的客观情况，视辞赋为末事在成年扬雄那里再正常不过了。因为如此这般的原因，所以作者林分认为罗先生“胶柱不化”而发挥出来的意思“还是个不通”。对于班固《汉书·艺文志》中的“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这句话，罗先生在书中解说发挥为“这便使赋有了文学以外的价值了”，林分先生认为罗先生大错特错，把动词的“赋”理解为“文体的赋”了，动词的“赋”就是“赋诗”：“古者于诗，是连歌带舞的，已成为大家公认的事实，若是把诗不按节中律的歌唱，而仅是背诵，便是赋诗。”此下林分先生就用了不小的篇幅去论说“春秋赋诗”的客观存在与盛况，论说完毕，矛头又转到罗先生这里，以为罗先生“弄巧成拙，更暴露了个人的浅薄”。他认为稍微有点文学史常识的人都“绝不容有类此错误的发生，若是文学批评史上有这种错误发现，那文学批评史也就没有什么存在的必要了”。对于这种在林分先生看来绝对“不容人宽恕的过错”，他提请罗先生“立时自省，勿惮改过”，以免“遗害于读者”。^④

虽然林分先生这么严厉的批评罗根泽先生的书，但是却是在具体问题层面，没有涉及观念层面，如果从观念层面观察罗先生的书的话，恐怕应该给予罗先生表扬。知识性技术性问题容易改正，观念层面则改正较难或者很难。判断一部书的高低好坏，当然要看知识性技术性问题层面，但更应该观察其观念层面。而当时或者稍后的观察者与批评者中确实就有这样一部分人看见了罗先生的书在观念层面的贡献，并以此认为罗先生的书优于或者高于郭绍虞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罗先生的书在1934年只写到魏晋六朝，到1940年代后写到晚唐五代，并以四分册出版，观念层面具有连续性与一致性，所以，此处我所叙述的批评或者评论要稍微跨越一点“草创期”，延伸到20世纪40年代。

其实，20世纪30年代已经有评论者看见了罗先生的书在观念层面的贡献并给予了赞扬，前述振珮与林庚先生的看法就是例证，而到40年代，似乎明显看见这一点的人更多一些，说的也似乎更直接一些。南屏先生的书评以为罗先生的四分册的文学批评史出版之前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只有“郭绍虞著本尚可看”，但是，进一步讲，他则以为罗先生的书比郭先生的书进步，而进步之处则在于根本观念与写法上不同于郭先生，不同在于罗先生“论述我国学艺”然而并不“比附西洋”并落实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以为“本书较郭著进步之点即由于此”^②，这话反推应该就是指郭先生的书论述吾国学艺就是在比附西洋。而刘溶池先生《评罗著〈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对罗著作作不以西学裁判中学将中国还给中国的严正态度进行了褒扬，而其《评郭、罗〈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则对郭先生、罗先生的书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比较，分期不同的比较，各分期中所论述的内容同异的比较，编著体例的比较，批评史上重要人物论说的比较，等等，比较的结果是罗先生的书“无论组织，体例，内容，见解……都较郭著高出一筹”，并且对郭先生书中的“文学观念演进期”、“文学观念复古期”的分期法，以及郭先生认为的前一时期重文、重形式，后一时期重质、重内容的说法，表达了尖锐的批评，以为“中国文学批评并不是如郭氏所论的那样”^③。刘溶池先生并不是只下判断而不论证的人，在文中他以这两期不

少的例证对郭先生的说法加以了反驳，反驳应该说是成功的。当然，刘先生也认为罗先生的著作也在少量的地方不如郭先生，例如罗先生的“魏晋六朝”的名称就不如郭先生的“魏晋南北朝”的名称妥当，这一看法是正确的，但刘溶池先生发表此文之前已经有若干人指出了这一点，例如《图书季刊》1944年新5卷第1期上面署名“壹”的作者就已经看出这个问题：“‘六朝’一词，当指建都今南京之吴、东晋、宋、齐、梁、陈而言；罗君前书兼述北朝文学，似宜名‘魏晋南北朝’。”张学骞先生的文章《评罗著〈中国文学批评史〉三书》也认为罗先生书中论说了不包括在六朝范围内的西晋时期的文学批评，所以“以‘魏晋六朝’命名，殊嫌观念不清，应当改名‘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然而张学骞先生文章中令人注意的地方，还是从观念与方法层面对罗先生著作的肯定与赞扬，他指出罗著有一个特点：“述解大体都是适可而止，不作过分的扩大引申”。他估计到有人会因此说罗著“未尽述解之能事”，但是他认为这才是罗著“绝大的优点”，他的理由是：“我们需要编著者替我们将各部分都解释清楚，不需要编著者将各部分都塞满主观意见”^④。我认为对于书名带有“史”字的著作而言，张学骞先生的看法恐怕是不易之论。张先生此处没有批评郭绍虞先生的书，但是否这意见暗含了对郭先生的书的批评，不得而知，但至少可以朝这个方向联想。

朱自清先生1934年为郭绍虞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写过书评，到了1946年又为罗根泽先生的四分册文学批评史写了书评。朱先生的书评文章《诗文评的发展》中对罗先生的著作作了多方面的评述与商榷，但我以为朱先生最肯定该书的还是在于该书的态度与方法，他认为罗著与郭著相比“情形就不同了。编制便渐渐匀称了，论断也渐渐公平了”。“公平”二字颇堪玩味，反推回去自然就是郭先生的书的论断可能就不“太公平”。朱先生所说的“公平”的意思在文章后面有较为具体的交待，那就是“照清楚诗文评的面目”，但朱先生也承认，这照清面目是借了“外来的意念”——文学批评，他认为罗先生的著作“的确能够借了‘文学批评’的意念的光，将我们的诗文评的本来面目看得更清楚了”。朱先生这里暗含一个悖论，我们可以提问：如何证明如

何确保借了、靠了外来的意念（“文学批评”）去“照”后的诗文评确实是诗文评的本来面目？朱先生也意识到了这层学理上的难处，所以，他说：“写中国文学批评史，就难在将这两样（按：指“文学批评”与“诗文评”）比较得恰到好处”。可能朱先生的意思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看个人自己的悟性与造化了。但显然朱先生认为罗根泽先生已经在这个方面做得比其他写《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人都好了，只是还没有达到“将我们的材料跟那外来意念打成一片”的最高境界，但他认为未来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与写作还得朝着“将中国还给中国，一时代还给一时代”的“方向走”，他认为这就是“要领”，而他认为罗根泽先生的书写得好就是因为他“抓得住（要领）的原故”^⑧。

朱先生对罗先生著作的评价是一个方面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从朱先生的书评中抽象出一个问题：如何写中国文学批评史。这实际上是朱先生评价郭绍虞先生与罗根泽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中的焦点，这个问题我以为直到现在也不过时。按朱先生的看法，写作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终极目标是“将中国还给中国，一时代还给一时代”，但朱先生又说要借“外来的意念”来完成这个任务，完成后的结果是外来意念不遮蔽中国的诗文评，中国的诗文评也不遮蔽外国的意念，中外两不伤，二者“自性”均得以保全。但朱先生的意思中似乎又可以推出不可能有不借外来意念而“中国还给中国”的那一天，如果朱先生心中有这一层意思，那么我在此处也确实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草创时期从时间上说应该是指1927—1937之间，因为我持这样一个观念，所以1940年代才新出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著作及其相关评论就不在此文论说了。至于1930年代已经出版的方孝岳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以及在那个时代以讲义形式存在的朱东润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由于篇幅的原因，只好另文再来检讨与论说了。

上述几个部分里面，几位著者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在各位评论者那里的反应是各种各样的，但基本上没有看见某位评论者对几位著者的书都不欣赏的情形，但是，谁写的《中国文学批评史》

都不欣赏而给以严厉批评甚至于否定的情况在现代中国又确乎存在过，作这个评论与批评的学者就是朱光潜先生。在《朱佩弦先生〈诗言志辨〉》一文中，朱光潜先生写道：“近三十年来中国学者很出了一些文学批评史的书籍。这些著述大半以时代为中心，把每个时代的文艺主张和见解就散见于当时文献中的七拼八凑地集拢起来，作一个平铺的叙述。这种体例有两大毛病。第一，就横的方面说，它不分主宾正侧，不能抓住每时代的几个中心问题，更不能见出关于这些中心问题的思想对于当时文艺创作和欣赏起了什么样的作用。第二，就纵的方面说，它不穷原委线索，没有指出每个重要的文艺思想如何起源，如何生展，如何转变，如何与其他思想交接离合。因为有两这大缺点，许多批评史都只是一些没有真知灼见的材料书。而且就材料而言，它们也是陈陈相因，不完不备，甚至断章取义，来附和作者的歪曲的见解。每部值得读的历史都是一个纵断面或横断面的解剖，都是一种凭作者理解的再造，想把历史的立体相和盘托出是不可能的，如果要这样办，结果必是囫圇吞枣，或是造垃圾堆。许多文学批评史就失败在这种和盘托出的企图上面。”朱光潜先生的话已经不仅仅是批评了，而是基本上否定了这些现代学者在“中国文学批评史”这个名目下的工作。朱光潜先生指出的问题确实是存在的，而且在某些《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著作中表现得更为显著，但是一笔抹杀恐怕也不是应该有的态度。既然朱光潜先生一笔抹杀此前所有的《中国文学批评史》，那么朱光潜先生能否指一条正路来明示学界呢？在文中朱光潜先生也确实指出了他认为正确的路径，他以为朱自清先生《诗言志辨》的路径就是正确的路径：“佩弦先生的《诗言志辨》之所以成为一个重要的贡献，也就因为它替文学批评史指点出一个正当的路径和一个有成效的方法。”而具体到朱自清先生该部著作到底明示了何种“正当的路径”与“有成效的方法”时，朱光潜先生以为是“大处着眼，小处下手”。“大处着眼”具体指的是朱自清先生著作以“诗言志”、“比兴”、“诗教”、“正变”四大观念为中心，“以大处落墨的办法画出全部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轮廓”，而“小处下手”具体则指的是一字不肯放松的汉学家精神：“他要用汉学家治学的——这

就是科学的方法和精神来治文学批评史”^⑩。看来朱光潜先生是主张“致广大而尽精微”的专而深的路线，而对通史类的著作不太看得起，可能朱光潜先生认为通史类的著作虽然大而全，但也容易流于浅而陋的境地。这看法恐怕有片面之嫌，但也不妨碍这种观点常常在学界私下流行，只是朱光潜先生公开说出来了而估计得罪了不少人。

朱光潜先生为中国文学批评史指出的路径是否就是正确的当然可以商榷讨论，但朱光潜先生提出这个问题确实又是具有重要价值的，而这问题还是此前朱自清先生评论中体现出的问题：如何写中国文学批评史。如果现在把这个问题提交给目前学界，我以为仍然是具有重要价值的。

- ①《胡适文存三集》，第212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年版。
- ②冷眼：《陈钟凡抄书都错》，《文学周报》第七卷，第663—665页，开明书店1929年版。
- ③开脱：《公文程式化的大著作》，《文学周报》第七卷，第635—637页，开明书店1929年版。
- ④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第5—6页，中华书局1927年初版、1929年三版。
- ⑤何儒：《陈钟凡先生的观念问题》，《书报评论》，1931年第1卷第6期。
- ⑥陈钟凡：《答汪静之先生“讨论诗经伯兮问题”的信》，《暨南周刊》，1928年第3卷第10期。
- ⑦季通：《容旁观者说几句公道话么》，《文学周报》第八卷，第202—206页，开明书店1929年版。
- ⑧1925年10月26日的《广东大学周刊》第二十八号上的《文科朝会记》提供的这段材料本人并未亲见，也难以见到，故此处系转引，转引自彭玉平《诗文评的体性》第6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 ⑨⑩⑪朱自清：《评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原刊《清华学报》1934年第9卷第4期，见《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下），第540页，第539—541页，第539—54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版。
- ⑩彭玉平：《诗文评的体性》，第7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 ⑪MF《读郭绍虞先生的文学批评史》，《燕大旬刊》，1935年第8期。
 - ⑫蜀翁：《读“读郭绍虞先生的文学批评史”》，《燕大旬刊》，1935年第9期。
 - ⑬李青崖：《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华年》，1934年第3卷第43期。
 - ⑭⑮张长弓：《读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文艺月报》，1935年第1卷第4期。
 - ⑯《辅仁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课程表及课程说明（民国二十一年度）》，《磐石杂志》，1933年第1卷第2—3期。
 - ⑰钱锺书：《论复古》，《大公报》，1934年10月17日。今见《钱锺书集·写在人生边上 人生边上的边上 石语》，第327—334页，三联书店2002年版。
 - ⑱振珮：《评罗著〈中国文学批评史〉1》，《学风》，1935年第5卷第4期。
 - ⑲李嘉言：《中国文学批评史》，《文哲月刊》，1936年第1卷第7期。
 - ⑳林分：《评〈中国文学批评史〉》，《众志月刊》，1934年第2卷第3期。
 - ㉑南屏：《中国文学批评史》，《国立中央图书馆馆刊》，1947年第1卷第4期。
 - ㉒刘溶池：《评罗著〈中国文学批评史〉》，《读书通讯》，1948年第166期。《评郭、罗〈中国文学批评史〉》，《读书通讯》1948年第159期。
 - ㉓张学骞：《评罗著中国文学批评史三书》，《读书通讯》，1945年第104期。
 - ㉔朱自清：《诗文评的发展》，《读书通讯》，1946年第113期。又见《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下），第544—54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版。
 - ㉕朱光潜：《朱佩弦先生〈诗言志辨〉》，《周论》，1948年第2卷第7期。又见《朱光潜全集》第9卷，第493—496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 本文得到201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中国古代文论现代研究史”（项目批准号：11YJA751051）和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研究专项项目“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论讲疏”（项目批准号 skjp201101）的资助。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责任编辑：王秀臣